

韩国中学校园欺负与



自杀风险关系研究的述评

□ [英] Young Shin Kim (扬·希恩·金) [美] Yun- Joo Koh (扬·乔·科尔)
[美] Bennett Leventhal (贝内特·利文撒尔)

摘要：校园欺负是校园暴力中最为常见的类型，而自杀也成为一种影响青少年健康的重要问题。该项研究采取同伴提名和自我报告的方法，调查校园欺负与自杀风险的关系，调研结果显示，受校园欺负的学生自杀风险较高，欺负 - 受欺负者这种类型的女生自杀风险更明显。

关键词：校园欺负；欺负 - 受欺负者；自杀风险

一、引言

有些观点认为，校园欺负行为是儿童或青少年时期一种没有大的妨碍或者说是“正常”的经历，甚至是相对有益的“成年仪式”。然而科学报告表明，欺负行为能够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心理和生理问题，他们也有可能表现出很低的自我评价、孤独、自闭及身体上的一些症状^[1-8]。同时，欺负者比他们的同龄人更消沉，更有可能在成年后有一些反社会行为和法律禁止的行为^[6,9]。近年来，一些与校园欺负有关的青少年自杀或试图自杀的报告，已引起人们对欺负与自杀行为之间关系的关注。韩国国家统计局的一份报告显示，11-19岁青少年中每10万人中就有15.5人自杀。自杀成为韩国引起青少年死亡的第三大原因，仅次于交通事故和癌症。

二、研究方法

1. 被试群体

2000年10月，以首尔(Seoul)和安阳(Anyang)两所典型的公立学校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全部学生选作被测试群体。每名被测试者需要完成同伴提名调查问卷和自我报告表，这些统计信息是在调查员的指导下，学生们在上课期间完成的，整个调查时间45分钟到60分钟。

2. 测量工具

该项调查采用了同伴提名和青少年自我报告两种方式，通过不同信息提供者分别界定欺负行为和自杀

风险，避免了因使用同一个信息提供者而造成误解，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

(1) 同伴提名册

校园欺负行为是通过韩国同伴提名录问卷 K-PNI (Korean Peer Nomination Inventory) 来界定的。该问卷由28个问题项组成：有11项来界定受欺负者，6项界定欺负者，11项为筛选项。在问卷中，学生需要写出与每一项描述类型相吻合的同性别同学的名字，每一项允许有多个提名。

为汇总每一个同学 K-PNI 的数据，本次研究使用标准化比例提名量表 (standardized percentage nomination scales)，即 SPN 量表，描述受欺负者和欺负者的分数。SPN 分数为1意味着被提名的个体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欺负者或者受欺负者量表上。在分界点方面，该项研究采用更为传统的方法把 SPN 分数 >1 区分为受欺负者和欺负者的分界点，增强每个欺负小组的同质性，以减少归类错误的情况。

校园欺负分为4个独立的类型。在受欺负与欺负量表中两项 SPN 分数 >1 的学生归为受欺负-欺负兼有者，而两个量表中只有一个 SPN 分数 >1，则根据大于1的分数归为欺负者或者受欺负者组，最后，两个量表中 SPN 分数 <1 的学生归为无欺负组。

(2) 青少年自我报告

韩国青少年自我报告 (K-YSR) 是根据国际通用的青少年自我报告修改而成的，适于11至18岁的青少年，用来表现青少年的自我报告能力及过去6个月中存在的行为。目前韩国青少年自我报告在特定性别和年龄方面已经形成了标准的模式，并广泛应用于韩国临床及科研中。

K-YSR 问卷通过两项问题项测定在过去的 6 个月中自杀或自我伤害行为和意念：第 18 项—“我试图故意地伤害自己或自杀”；而第 91 项—“我考虑过自杀”。在问卷完成之前还有一个附加问题用来评估 2 周内的自杀意念。每个问题项可以选择 3 个量化刻度——0 代表从来没有，1 代表有时，2 代表经常。选择答案 1 或 2 则被界定为有确实的自杀意念或行为。

焦虑和抑郁的症状是通过使用 K-YSR 中的焦虑/抑郁量表来测量的。根据阿肯巴克 (Achenbach) 所建议，当量表中 T-分数 ≥ 65 时，则被认为是临床意义上的焦虑或抑郁症状 14。

(3) 统计分析

本项研究使用了描述性数据、卡方检验、逻辑回归等方法检验自杀风险与校园欺负之间的相关性。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中，通过控制已确认自变量来实现各种因素对自杀风险交叉影响的控制，而这些因素同样与校园欺负有着关联。

为了探究缺省数据是否会影响校园欺负与自杀之间的相关关系，本项研究从缺省的数据点与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角度着手进行分析。由于采用直接的数据收集方式，并不存在与欺负有关的缺省数据点。从表 2 可以看出，唯一有关联的是那些与家长的教育、家庭结构有关的缺省数据（家长的教育百分比：父亲是 97.1%，母亲是 93.9%，家庭教育百分比：94.2%）。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缺省的数据不会产生干扰影响，校园欺负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因存在未参与者或者缺少答复而造成曲解。

逻辑回归需要 3 个步骤完成。首先，运用单变量逻辑回归分析来探究校园欺负与自杀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初步的比值，即 OR 值。然后通过多元逻辑回归分析得出一个调整过的 OR 值，即调整比值，来对与自杀有关的自变量产生的交叉影响进行控制。最后将相互作用项（欺负与共同变量）运用到模型中。那些能够明显改善模型，且本身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在皮尔逊系数 < 0.05 时）的相互作用项保留在最终的模型中。

三、研究结果

1. 被试群体

有 1718 名 (97.7%) 学生完成了此项研究。大多数学生是处于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的完整家庭。

SPN 问卷中受欺负者与欺负者分数按照以下顺序

表1：研究主题的人口统计特征 (N=1718)

特征	n	%
住处		
首尔	613	35.7
安阳	1105	64.3
性别		
男	972	54.8
女	776	45.2
年级		
七年级	846	49.2
八年级	43	50.8
家庭结构		
与父母双亲住在一起	1499	87.3
与父亲生活在一起	43	2.5
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54	3.1
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	22	1.3
父母受教育程度		
父亲 ≤ 12 年	745	43.4
父亲 > 12 年	922	53.7
母亲 ≤ 12 年	1002	58.3
母亲 > 12 年	611	35.6
社会经济地位SES		
高等	29	1.7
中等偏上	296	17.2
中等	1150	66.9
中等偏下	174	10.1
低等	13	0.8
校园欺负		
未涉及者	1031(532 :499)	60.0(56.5 :64.3)
只是受欺负者	243(151 :92)	14.1(16.0 :11.9)
只是欺负者	290(165 :125)	16.9(17.5 :16.1)
受欺负与欺负兼有者	154(94 :60)	9.0(10.0 :7.7)

皮尔逊卡方检验用来检验校园欺负类型中性别的差异。由于缺省值的存在，各部分的比例之和并不是100%。括号中的数字是男生、女生的数量或比例。
P=.006

进行比较：未涉及者、受欺负者、欺负者、欺负-受欺负者。SPN 受欺负问卷中各项中位数分别为 0.00, 2.63, 0.21 和 2.86，这表明受欺负者和欺负-受欺负者被欺负的量值是相同的。然而 SPN 欺负者问卷中各项中位数分别为 0.00, 0.00, 2.50 和 4.59，这表明欺负-受欺负者比单一欺负者更容易欺负其他同学。

2. 欺负 - 受欺负者和受欺负者的自杀情况有所增加

本项研究对校园欺负 4 种类型的自杀风险和焦虑/抑郁症状进行了比较。虽然报告显示，欺负者和欺负-受欺负者所占焦虑/抑郁的比例，比受欺负者和

表2：被试群体的自杀和焦虑/抑郁症状的频率

所有被试人群	学生的数量 (%)			
	S/I B 6个月	SI 6个月	S I 2周	A/D 6个月
	(N=1718)	(N=1718)	(N=1718)	(N=1718)
男生	58 (6.2)	177 (18.8)	241 (33.4)	18 (1.9)
女生	88 (11.3)	280 (36.1)	298 (50.6)	30 (3.9)
总计	146 (8.5)	457 (26.6)	539 (41.1)	48 (2.8)
P值	.000	.000	.000	.014
校园欺负				
未涉及者	75 (7.3)	263 (25.5)	293 (37.0)	27 (2.6)
受欺负者	24 (9.9)	64 (26.3)	77 (43.3)	3 (1.2)
欺负者	26 (9.0)	75 (25.9)	106 (46.7)	13 (4.5)
欺负-受欺负者	21 (13.6)	55 (35.7)	63 (54.8)	5 (3.2)
总计	146 (8.5)	457 (26.6)	539 (41.1)	48 (2.8)
P值	.048	.064	.001	.141

S/I B指自杀/自我伤害行为，SI 指自杀意念，D/A指焦虑/抑郁症状皮尔逊卡方检验用来检验性别与校园欺负类型在自杀和焦虑/抑郁症状方面的差异。

未涉及校园欺负的学生都高，但对于欺负-受欺者来说，在过去的6个月中，自杀行为与自杀意念的风险都有显著的增加（见表2）。欺负-受欺者存在的自杀风险要高于受欺者。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虽然在受欺者量表中，欺负-受欺者的分数与受欺者分数大体相同，但在欺负量表中，欺负-受欺者的分数比单一欺负者分数高，这就意味着受害者与受欺者更为相似，但同时其欺负行为比欺负者更为严重。作为一个受欺者，其自杀风险增加更明显，然而在所有的欺负者中，只有最为严重的欺负者自杀风险才有所增加。也许由于欺负-受欺者带有一些自杀的附加风险，他们自杀风险最高。这种观点也得到以前研究的支持。^[10-12]其次，欺负-受欺者与单一欺负者或者受欺者不同，至少就自杀风险而言是有差异的。也就是说欺负-受欺者不仅自杀意念持续的时间比其他类型持续的时间长，而且在实行自杀想法上更为频繁。欺负-受欺者类型的孩子行为更具有攻击性，对同伴更容易采取粗暴拒绝和带有破坏性的行为。^[13,14]一项关注欺负-受欺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他们明显地表现出社会失调和行为失调的特征，包括多动症、冲动行为、情绪管理能力欠缺等。此外，他们更有可能表现出情绪低落、社会亲和度较低、学习成绩差、更多地排斥同伴。总之，在许多方面欺负-受欺者与单一欺负他人或受欺负的孩子是不同的。目前的研究结果可能给欺负-受欺者类型又添加了一项特点：自杀风险增加。自杀意念或自杀/自我伤害行为的增加，对欺负-受欺者产生了独

特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能够控制那些已经确认了的、与自杀危险有关的因素。

3. 校园欺负与性别之间相互作用对自杀风险的影响

校园欺负和性别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自杀意念有关。研究表明，在前2周内，男生受欺者、欺负者以及欺负-受欺者的OR值分别为0.9, 1.1, 和1.3, (置信区间分别为0.6-1.5、0.7-1.8、0.7-2.3)，而女生OR值分别为2.8、2.0和2.8 (置信区间分别为1.6-5.1、1.2-3.1和1.4-5.7, 见表3)。与男生相比，女生的自杀意念更频繁，自杀风险更高。在焦虑/抑郁的症状上，这种性别差异的特点同样显示出来。

校园欺负和性别都是影响自杀行为和意念的危险因素。这两种独立的危险因素有明显的相互作用，这使得被试群体存在自杀意念的风险进一步增加（见表3）。然而，对于校园欺负，女生比男生更敏感，更容易引起自杀意念。当校园欺负持续的时间超过一定期限时，自杀在男生和女生中都变得比较普遍。因此，超过一定时间性别差异也就消失了。

四、建议

自杀是影响青少年最为严重的健康问题之一。大量的研究已经确定了与青少年自杀有关的危险性因素。目前的研究表明，校园欺负，尤其对于欺负-受欺者来说，已经成为青少年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一个重要危险性因素，与焦虑或抑郁、性别、社会经济地位、

表3：自杀与校园欺负之间的关联

	OR粗略值	95%CI	调整OR值	95%CI
在过去6个月内的自杀/自我伤害行为 (N=1570)				
未涉及者		1.00	1.00	
受欺负者	1.40	0.86-2.26	1.69	1.00-2.85
欺负者	1.26	0.79-2.00	1.16	0.70-1.94
欺负-受欺负者	2.01+	1.20-3.37	1.85+	1.01-3.40
过去6个月内的自杀意念 (N=1570)				
未涉及者	1.00		1.00	
受欺负者	1.04	0.76-1.44	1.29	0.91-1.84
欺负者	1.02	0.76-1.37	1.11	0.80-1.54
欺负-受欺负者	1.62+	1.13-2.32	1.90+	.26-2.87
上两周的自杀意念				
未涉及者	1.00		1.00	
受欺负者	1.30	0.93-1.80	0.92	0.57-1.49
欺负者	1.49+	1.11-2.01	1.11	0.70-1.76
欺负-受欺负者	2.06+	1.39-3.06	1.27	0.71-2.28
受欺负者-性别			3.05+	1.42-6.56
欺负者-性别			1.77	0.92-3.39
欺负-受欺负者-性别			2.22	0.89-5.52

-表明交互项
调整变量为焦虑/抑郁症状、性别、住处、家庭结构和社会经济地位SES。
+P<.05

住处、家庭结构等其他有关自杀的危险因素相独立。

校园欺负是一个可减弱的危险性因素，比较容易受社会干预的控制，例如，对欺负行为进行8-20个月的干预，就能明显减少50%或者更多的欺负行为。由此可以引申，如果能对欺负行为进行有效的介入，减少各种形式的欺负行为，那么一些自杀意念、自杀计划、自杀企图，尤其在一些易受伤害的敏感人群中的自杀行为都将会被抑制。即使校园欺负不能被完全有效地遏制，但是对其介入能够确定危险的目标人群，对他们进行更具体的筛选，甚至进行治疗干预。特别要注意对校园欺负中的欺负-受欺负者、受欺负者以及所涉及的女生给予仔细的临床关注，保护他们不受自杀以及其他校园欺负伤害所引起的不利结果。

本项研究对韩国校园欺负行为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借鉴作用和意义。

1. 创新的研究视角

对校园欺负的研究起源于北欧挪威的奥韦尔斯教授，随后，许多国家的研究者和教育部门的广泛重视校园欺负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韩国从校园欺负与自杀风险之间关系的视角入手，将青少年中存在的两种重要现象联系起来，检验出二者之间统计学意义上的关系。这项研究首次证明

了不仅校园欺负与自杀意念存在着关联，而且与自杀/自我伤害之间也存在着关系。一方面，引起人们对校园欺负的重视，希望通过建立干预机制以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为判断自杀高风险人群提供了另一种表征，为预防自杀提供一个对象，进而减少自杀意念与行为的产生。

2. 方法体系的创新

在为数不多的关注校园欺负与自杀风险几项研究中，由于方法体系和分析数据样本不足，调查结果的普遍化也受到了限制。目前存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研究方法上，使用相同的信息提供者来确定欺负行为和自杀行为（如使用共享方法变量）。欺负的自我报告是以个体对社会环境的自我感知为基础的，然而，报告者的病态心理可能会对社会环境中正常的社会事件产生误解，这样就干扰了自杀与欺负之间关系。而该项研究利用同伴提名的手段来界定欺负行为，用自我报告界定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不同的报告者确定不同的问题，避免报告者本身的误解，在二者之间检验出严格意义上的关系。另外采用欺负量表与受欺负量表，将两种量表中的自杀风险变为独立的过程进行考虑，更为具体、直观，便于细化分析不同欺负类型的自杀风险，进行干预时重点突出，方向明确。

3. 对缺省数据的检验

缺省数据有时会对关系型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混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了探究缺省数据是否会影 响校园欺负与自杀之间的相关关系，该项研究从缺省的数据点与二者是否存在关联的角度着手进行分析。由于受到数据收集方式所限，并不存在与欺负有关的缺省数据点。唯一有关联的是那些与家长教育和家庭结构有关的缺省数据，缺省的数据不会对校园欺负与自杀之间的关系产生干扰影响。

4. 研究的局限性

正如大多数研究一样，本项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首先，结果和预测变量只被测量过一次，本项研究的代表性抽样特点也限制了对结果的解释。其次，对焦虑/抑郁症状的量定是基于自我报告表而不是临床上的估测。而以自我报告数据为基础，其分析结果的科学性也因此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再次，焦虑/抑郁与三个关于自杀问题中的两个问题都是来自于相同的问卷。由于在焦虑/抑郁量表和关于自杀的问卷之间出现重叠，引起了在校园欺负与自杀之间的高关联

性，这样就可能会淡化二者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来自各国的研究资料表明，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校园欺负是校园暴力中常见的一种形式。然而，长久以来由于人们对其缺乏一个科学的认识，以致对校园欺负带来的危害，社会也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韩国进行这项研究证明，在校园欺负与自杀风险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将校园欺负定位于一个能够引起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的严重现象，希望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既然校园欺负与自杀风险有着高度的关联性，那么，目前在青少年中出现的其他影响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现象，如网游成瘾、校园暴力、虐待动物等，是否也与校园欺负有着相关性呢？这些都为国内的研究者和教育者提供了新的课题。■

扬·希恩·金：美国莫雷学院

扬·乔·科尔：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

贝内特·利文撒尔：美国芝加哥大学

编译/周华珍、李华香

责任编辑/方奕

参考文献：

- [1] Boulton MJ, Underwood K. Bully/victim problems among middle school children. *Br J Educ Psychol.* 1992 ;62(suppl) : 73- 87.
- [2] Boulton MJ, Smith PK. Bully/victim problems in middle- school children : stability , self- perceived competence , peer rejection and peer acceptance. *Br J Dev Psychol.* 1994 ;12 315- 329.
- [3] Byrne B. Bullies and victims in a school setting with reference to some Dublin schools. *Ir J Psychol.* 1994 ;15 :574- 586.
- [4] Rigby K , Slee P. Dimension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 among Australian children and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J Soc Psychol.* 1993 ;133 33- 42.
- [5] Rigby 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orted health and involvement in bully/victim problems at school among male and female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J Health Psychol.* 1998 ;3 :465- 476.
- [6] Salmon G , James A , Smith DM. Bullying in schools : self reported anxiety , depression , and self esteem in secondary school children. *BMJ.* 1996 ;317 924- 925.
- [7] Slee PT. Situational and interpersonal correlates of anxiety associated with peer victimisation. *Child Psychiatry Hum Dev.* 1994 ;25 97- 107.
- [8] Williams K , Chambers M , Logan S , Robinson D. Association of common health symptoms with bullying i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BMJ.* 1996 ;313 :17- 19.
- [9]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 basic facts and effects of a school based intervention program.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1994 ;35 :1171- 1190.
- [10] Grunbaum J , Kann L , Kinchen S , et al. 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United States , 2001. *MMWR Surveill Summ.* 2002 ;51 :1- 62.
- [11] Lee JW. Mortality Statistics , 2001. Daejeon , Korea : Korea National Statistical Office ; 2002.
- [12] Chun Y , Lee S. Analysis of variables related to adolescent's suicidal ideation. *Kor J Youth Stud.* 2000 ;7 221- 246.
- [13] Kaltiala- Heino R , Rimpela M , Marttunen M , Rimpela A , Rantanen P. Bullying , depression , and suicidal ideation in Finnish adolescents : school survey. *BMJ.* 1999 ;319 348- 351.
- [14] Prinstein MJ , Boergers J , Spirito A , Little TD , Grapentine WL. Peer functioning , family dysfunction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in a risk factor model for adolescent inpatients' suicidal ideation severity. *J Clin Child Psychol.* 2000 ;29 392- 405.